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六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三二期 ——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12d）

【难忘岁月】	文革纪实：林彪外逃震撼小县城	金 渝
【人物传奇】	杨宪益传（节选一）	雷 音
【亡灵祭坛】	赵九章之死	李鸣生
【浩劫实录】	68年，姚桐斌去世前后——杨国宇日记	杨国宇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难忘岁月】

文革纪实：林彪外逃震撼小县城

• 金 渝 •

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虽然内地还是金秋时节，可是地处高寒的S县，天气已经十分严寒。树木凋零，朔风呼啸。秋冬之际，S县从半夜到正午狂风由雪山向戈壁刮，刮得行人走路踉踉跄跄；正午过后，风势变小，风向渐渐地掉转，变为从戈壁向雪山刮。到入夜，戈壁狂风如狮吼虎啸，如鬼哭狼嚎；然后慢慢地转为凄厉和呜咽，风向又在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此时全县“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也有些日子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们县中小学集中学习会开了一上午。下午清查小组成员和骨干分子开碰头会，我们则奉命写检查。我写了两行，心烦。妈妈的，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说：死两回没听说，死一回躲不过。敬爱的林副统帅说：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我格老子死猪不怕开水烫，随便！我撂下纸笔，上杨才铭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找报纸看。

推门而入，却见老杨坐在床沿上发怔。他脸色苍白。我问：“你不舒服么？”他转过头直勾勾地瞪我一眼，随即起身奔过去把门关死，慌慌张张地劈头问我：“出大事了！发生非常重大的

事情了！你听说了么？”我莫名其妙，见他那紧张的样子，我不禁也紧张起来，连忙问：“啥事？啥大事？”他两眼直僵僵地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如同梦呓似的幽幽地说：“事情太可怕了！太严重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不敢给你说，不敢说……”

我好生奇怪。一再追问，他却死也不肯再吐一个字，只是眼睛发直，喃喃自言自语：“太可怕了……”见他如此卖关子，我心急火燎，恨不得扳开他的嘴把那重大事情掏出来。同时我脑子里飞旋：能发生什么事情让老杨如此大惊小怪？杨才铭是我们一帮年轻同事的老大哥，他忠厚稳重，同我们相处融洽。不过他有点小世故，过于谨小慎微——此乃在多次阶级斗争运动中备受惊吓的人所共有的性格，是惊弓之鸟那样的。他是从不开玩笑捉弄人的，何况在运动中间，他照例把嘴巴闭得很紧很紧。今天竟然如此说话，实在反常。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是不是谁家女人偷了汉？或是哪个野男人勾引了谁家的黄花闺女？”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套他说话。在这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一个月才能看上一回电影的荒僻小城，最能耸动人耳目、令人津津乐道的文化生活，莫过于男女艳闻了；如果是县上哪个头头搞女人东窗事发，那可是爆炸性新闻。

那知老杨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明显地对我的猜测显出鄙夷之色：“不是不是，比那大得多了，天塌下来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杀人放火、男盗女娼更有轰动效应，就央求、恳求他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杀人案件？谁杀了谁？是不是谁放了火？是不是谁扒了灰？可老杨就是死活不肯透露一个字，只是低声嘟囔：“不敢说，不敢说，如果这事是假的，那谁散布了谣言，谁就没命了……”

急惊风遇上慢郎中，他越不肯说，我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越是迫不及待想知道，他越是面露恐惧守口如瓶。我使出浑身解数，始终未能从杨才铭口中掏出那如天塌下来的大事究竟是什么。我心里实在痒得难受。最后我悻悻地说，你不说，我去问别人。老杨急忙带着哭腔说：“不要问！千万不要问！要问，也千万不要提我给你说了什么了啊！”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么。真是的！看他那惶惶然的样子，我觉得事情真蹊跷。我急不可耐，一心想满足好奇心，边往外走边回头说：“放心吧，不会出卖你。”

从杨才铭那里出来，我直奔王树田的宿舍。文革开始后，西北民院被军队占用，出身不好和站错队的教职工被遣散到民族地区，王树田被打发到S县来。中学里我和王树田向来友善，他消息灵通，他若知道什么，肯定会告诉我。

一进门，就见王树田正在埋头写检查，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沓，足见他的“五一六”问题不少。我问他听到什么重大新闻了没有？他抬起头来，一脸的茫然。我告诉他，听说发生了天大的事，非常可怕，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王树田笑笑，漫不经心地说可能有人开玩笑。我就说，是老实大哥杨才铭说的，不可能是开玩笑。王树田开始重视我的话了。他想了又想，想不出能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到底能有什么重要消息把谨小慎微寡言少语的老杨唬成那样呢？

近两年小道消息时有时无，陈伯达出事了的的消息是传过一阵子，谭甫仁被刺杀也是民间传说，不过都没有引起民众惊恐。像基辛格访华那样的特大新闻，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预告有重要消息将在某时刻发布，请听众届时收听；同时县上也接到省上电报通知，要求各单位领导组织群众收听某时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于是我们奉命列队准时坐在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大喇叭下收听。喇叭下，县革委会保卫部的民兵还在四周巡视；他们当然是根据上级指示，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时乍一听见与我们中国不共戴天的美帝大头子尼克松要来中国，人人震惊，个个目瞪口呆！人们都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一连几天精神恍惚；不过谁也没有说一个字的评论。后来县上传达文件，老百姓被告知，尼克松是打着白旗要到中国来

的；而且县革委会主任强烈暗示，美国总统尼克松是朝拜毛主席来了。

自那以后，还能再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呢？我和王树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俩猜测也许是中苏边界上出了问题，或者与台湾有关。或许什么也没有，是杨才铭神经不对劲了。

我满腹狐疑，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前事皆忘，我早早去到城关小学会议室，继续参加揭批“五一六”的县城全体教师会。

众老师各就各位，我也坐我的老位置，摆出沉痛反省状；心里盘算，教员同仁中本地的“五一六”问题行将检查完毕，我暂不开口；俟检查外地“五一六”问题的同仁谈过三五位后，我再狗尾续貂不迟。

忽然我身旁的柴国金凑过头来。我心里一动，忙把耳朵伸过去。只听他悄声说：“发生重大事情了，听说了没有？”柴国金是民兵排长，年纪比我轻，可比我老练，现在刚一开会就和我耳语，必定有重大消息。我忙接上他的话茬：“听说有重大事情，究竟是啥事？”柴国金缩回头，极神秘地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才又凑过来用手捂着他的嘴和我的耳朵，以极低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叛国投敌……”

我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脑子嗡地一下，似遭大棒抡击，天旋地转，一阵眩晕。我瞪大眼睛，顿觉失明又失聪，眼前仿佛有巨大的蘑菇云冲天升起！我觉得我要失声惊呼。我转过脸直勾勾地盯着柴国金，仿佛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反过去又把柴国金吓得脸色苍白。停了片刻，他又凑过头来，我木然地把耳朵靠过去。他的话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飞机越境时被打下来了……，只差几秒钟……”

我感到心慌，脑胀。太可怕了！太严重了！我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又转脸直眉瞪眼地看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就凑过头去颤抖着问他：“消息可靠吗？”他把嗓子压得低低地说：“政治部康学谦说的。昨天党员开大会，已经传达了……”啊！康学谦，那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生，典型的京油子，是本县传送小道消息的权威人士。我有点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了。可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一个月前的国庆节期间，我从石包城公社回县上。路过玉门镇，在小镇电影院的宣传栏前我看见有几个人在看什么。我凑过去驻足观看。原来宣传栏里贴着一张一尺大的肖像照，是秃顶的林彪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学习毛选。这是我头一次、也是唯一见到的林彪免冠像。我屏息凝神地注视他的秃顶。不知为什么，我越看越怕，可越怕越要看，有一种怪怪的异样的感觉。陆陆续续又有人走过来看林彪秃头照。人人一言不发，连大气也不出一声，只管默默地专注地看。我看了老半天才离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江青拍摄的杰作。我哪里能晓得，林彪此时早已死于非命了……。

……我痴呆了半天，定定神，偷眼环顾会议室，感觉果然有人神色异常：杨才铭泥菩萨似的，还在发怔，就像昨天在他房子里一样；何秀两眼呆滞，大口大口地吞烟，按说烟瘾再大也不至于如此一口接一口地毫不停歇；张涛紧锁眉头，好像有无限的大苦恼……；还有的人如遭电击，脸色僵硬，如灵魂已然出窍。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肯定也知道了。显然是这个不敢使人相信的天塌下来的消息，在折磨着向来关心国家大事、以政治通自居的他们的神经。我回忆以往，绝没有见到过眼下如许神情稀奇古怪的人。

不过大部分老师还是通常的精神状态：正襟危坐，诚惶诚恐，脑子里大概是如何交待自己的“五一六”问题，以求蒙混过关。这些自知有罪的人脸上是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时所特有的自卑、凄凉、苦闷和“臣罪当诛兮皇恩浩荡”的表情。

王树田在翻动他的发言稿，这是他预备发言的习惯性动作。我连忙向他使眼色，摆手制止他。我的直觉是，既然发生如此石破天惊的事，清查“五一六”恐怕要拉倒了吧！王树田看见我的手势，有点不知所措；他犹豫不决，但是终于把发言稿重新折迭起来压在《毛主席语录》本下面。景兆年校长的长篇发言开始了。他颇受我们的尊敬，从五八年起他就被视为右倾，幸而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才没有怎样挨整；不过由县委宣传部长改任中学革委会主任，在当时无疑是大贬黜。此次清查运动，有人要把他打成S县“砸烧武装部大门‘五一六’事件”的“幕后摇鹅毛扇子的黑高参”，责令他讲清楚。他平时讲话很有水平，慢条斯理的，还有些幽默感，很能吸引听者；可是今天他的发言，只有只言片语跳进我的耳朵。

我头疼，我心慌，我发懵。林彪出事了，那么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实现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的崇高而伟大的目标而进行的；胜利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毛泽东亲自选择林彪做自己的可靠接班人和副统帅，因为他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忠实学生，这已经写进了庄严的党章，还要载入神圣的宪法。谁能把文化大革命同林彪分得开呢？林已然是仅次于毛的神，这位次神为何转眼要叛国投敌呢？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无法想象！

我想得头脑发胀，我觉得我忽而发高烧，忽而打寒颤。我不由自主又反过来怀疑自己的耳朵，进而怀疑柴国金。我斜眼偷瞥柴的脸。莫非他受清查运动领导小组的指示，设套子故意对我讲反革命话，引诱我随声附和，然后倒打一耙，置我于死地？我的腿哆嗦起来，背上冷汗淋漓。可是杨才铭呢？难道他俩串通起来要把我做成“现行”么？不会吧？杨是我始终认定的憨厚者，如果他也有害人之心，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了……。

这个晴天霹雳的小道消息紧紧攫住我的神经，我惊异不定，我胡思乱想，我如患了病似的呻吟，挣扎，我渴望获得最确实的答案。

散会后，我魂不守舍，王树田使眼色叫我去他的宿舍，自然是因为我制止他发言令他摸不着头脑。从祁连雪山刮来的风正猛，我跟着王树田趑趄而行。

一进他的门我就按捺不住地问他：“特大消息你还没听说么？”王树田瞪着一双大眼睛摇头：“没有啊，究竟发生什么了？”我追问：“你真的不知道？”他回答说昨天他写检查稿直到半夜两点多，哪里也没有去过。我摘下帽子，说：“林副主席——”用手给他比划了一个飞机倒栽葱的手势。他更胡涂了，大眼睛瞪得更大。我这才如此这般把柴国金的话学说一遍：“飞机越境时被高射炮打下来了，都死了。他的女儿林豆豆在上飞机前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后面的话也是柴国金在景校长发言时断断续续说给我的。

王树田的眼睛越瞪越大，终于瞪成一双牛眼睛；他的嘴巴也越张越大，像一个大窟窿。好半天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能吗？真叫人不能理解……”他语无伦次，脸色由吃惊变为恐惧。我说：“是呀，做梦也想不到……”我一下子又害怕了：“如果是造谣，那可……”，王树田马上斩钉截铁地说：“那可就是不可饶恕的现行反革命了，非掉脑袋不可。”

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我和王树田吓得同时跳起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部的人抓我们来了。

进来的原来是女老师康炳清；她和王树田是校友，又都是数学老师。她心地善良，平时我和王树田议论政治，对她不设防。可是今天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和王树田面面相觑，紧闭起嘴巴。看着我们呆若木鸡的样子，康炳清深以为怪，她问：“你们在说啥呢？”

王树田缄口不言。后来还是我沉不住气，脱口而出：“林彪垮台了！”一言既出，吓得康炳清转过身赶快把门关上，回过头带着哭腔颤声说：“你胡说八道啥？哪里听来的谣言？你不想活了？”王树田打断康炳清的叫嚷，说方才他心里一分析，觉得这消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他头脑向来冷静，于是给我们分析：柴国金的消息来源比较可靠；昨天杨才铭虽然只露了口风，可绝对是同一消息；今早的开会，气氛是有点异常；昨天全县党员开大会他恍惚听谁说过——康炳清忽然插嘴说，今早上她刚一出门就碰上古怪事：已经有半年多时间不和她说话的邻居，竟鬼鬼祟祟走过来问她，昨天去开党员会了没有？把她问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邻居明明知道她并非党员，却如此发问。当时她想这个邻居可能没睡醒，发神经病呢！就漫不经心地回答，不知道开会的事。现在想来，邻居岂不是在拐弯抹角试探她听到什么没有。

王树田忽然奔到桌子边翻报纸。最后翻出一篇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他在字里行间搜寻。终于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一行字让我们看：“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滔天罪行……”

“叛徒卖国贼”，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名词。文革开始以来，我们都无师自通地知道了一些潜规则：如刘少奇没有被公开点名之前，用“中国的赫鲁晓夫”影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是特指邓小平；“反革命两面派”则代表陶铸。去年又有了“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的提法，消息灵通人士说那是指陈伯达。现在这个“叛徒卖国贼”，肯定是一个重量级的大人物！但是报上既没有点明“叛徒卖国贼”是何人，也没有点明“叛、卖”的具体事实。不过这足以同我们听到的片言只语互相印证了。

种种迹象显示，林彪垮台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康老师这才惊魂甫定。我们三人大眼瞪小眼地感受着“叛徒卖国贼”新名词的强烈刺激。我们小声议论，这事件太重大太可怕了；它越是真的，就越令人惊悚，肯定会吓疯很多人。王树田说我阻止他发言是对了，出此大事，人心惶惶，还清查什么“五一六”呢！

忽然有人在门外喊叫：紧急通知！晚上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

十一月一日晚，在电影院内召开S县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中央文件。风声已经传开，来开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电影院座无虚席。晚来一步的人便在门厅站立。没有人打听所要传达的文件的内容。人们表情严肃紧张。个别人悄声和熟人打招呼。大部分人只是意味深长地交换眼色。

担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张凤翔政委宣读中央文件。文件是分批逐级扩大传达，这是他在本县第四次宣读。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听众无不竖起双耳屏息凝声谛听。于是文件上的措辞清清楚楚地入耳而来：“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尽管张政委得知此消息全县数他最早，但显然他还没有从最初的极度震撼中恢复正常。他的嗓音发颤，手也打颤；那红头文件似是一只烫手的山芋。

张政委本来是一位脾气平和的军人，很有些文化。在走马灯似换来换去的革委会主任之中，

他是唯一不把“负隅顽抗”念成“负隅顽抗”、“赤裸裸”念成“赤果果”、“撑腰”念成“掌腰”、“悼念”念成“掉念”的人。往常传达文件，他总要解释一些词句或重复某些段落，甚至有时还要发挥一番；可是这一次的传达，他只是一字一句、平铺直叙地照本宣科。我猜想他惟恐多说一个字或是流露一丝个人倾向会承担严重责任。

文件很长。除了张政委的声音，电影院里静如旷野，寂如坟场。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东张西望；数百名到会干部职工个个如同僵尸，如同泥塑。这是县城史无前例的一次无声的大会。然而在这静寂中，与会者的脑海里，狂涛巨浪在呼啸，万钧雷霆在轰响，十二级台风在震撼，威力强大的原子弹在爆炸。

九月十三号，我默默地心算，那林彪摔死已经四十九天了，可是我们都蒙在鼓里……。

文件宣读完毕，没有多说一句话，张政委就直接宣布散会。人们默不作声地离开。我偷眼观察，人人神情异常，尽量避免和别人对视，咳嗽的人也格外捏着喉咙。

天很冷。黑夜里，我们几个老师拱肩缩背，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学校。半天没有人吱声。临近校门口，我忍不住冒了一句：“我觉得林彪垮台比刘少奇垮台还叫人高兴。”王树田和杨才铭装作没有听见我说话，柴国金、张涛、闫尚雄、何秀连忙往旁边一躲。片刻，何秀冷冷地丢过来一句话：“你说话注意点！”再无人接话茬，都好像身上没有带耳朵。何秀是个直脾气人，他如是说其实包含着好意；因为我的这句话很可能会被积极分子们分析成刘少奇倒台我不高兴，那我就死定了。

看看看！毛泽东专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

文件传达之后，如同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来。人们在震惊和恐惧中纷纷奉命销毁一切地方的林彪题词和林彪照片。原先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最忠实的学生和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林彪的合影巨画，一夜之间统统消失。单位奉命督促和监视职工销毁私人物品中的林彪图像和题词。我的大学毕业证有林彪题词的“四个伟大”和“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名言，一撕一扯，毕业证残缺不堪，我索性扔掉。几个笔记本，有很多毛、林合影的插页，我看着林彪的像，心里仍是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忍不住冒险留了几张毛林亲密无间在一起的照片。

林彪仓皇出逃，使追查“五一六”的运动就此不了了之，我们死里逃生。为证明林彪是叛徒卖国贼而向内部传达的林彪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发给各单位。人们以批判的名义争相传看。许多人掩饰不住对《纪要》中称毛是“当代秦始皇”、阶级斗争是“绞肉机”、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用语的浓厚兴趣；似乎享受着这些词语所产生的感官快乐。大家反复掂量它们的分量，再三咀嚼其中的含义。我私下认为林彪说的是大实话。不过人们决不互相交换看法，只是你争我抢地把《五七一工程纪要》看了又看，看时眼神闪烁，目光游移。在批判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疾言厉色地批判林彪反动透顶、阴险毒辣、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必须碎尸万段、千刀万剐。

事情的另一面是，最高领袖的威望随之动摇。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不过是刘邦朱元璋诛灭开国元勋的历史重演罢了！文革的龌龊虚伪开始被一般老百姓感觉到。红色恐怖失去了它得心应手的威慑力。这时候广播开始经常播放“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听上去给人理屈词穷、蛮不讲理、撒泼耍赖的感觉。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了。

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六八年十月中央全会宣布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时，特大喜讯传来，举国上下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人人都极为夸张地装出无比激动无限幸福的模样参加庆祝游行，高呼拥护的口号。可是这次“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怎么没有举行庆祝游行呢？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庆祝；当然那时候谁都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人轻易议论林彪问题，只是不断地开会，不停地念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报刊文章。大家一边拼命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口诛笔伐，一边偷偷地观察别人的脸色，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

后来我还又想过，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何以见得？文革之初，毛故意让刘少奇领导运动，随后马上宣布刘少奇派工作组是犯了镇压群众的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哑巴吃黄连，不得不靠边站。毛一本正经地宣布：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当权派。可是当他终于打倒了刘少奇、彻底铲除了刘少奇的势力和影响后，却言而无信，翻脸不认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百姓。又是派工宣队，又是派军宣队，又是军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无一不是向群众大开杀戒。其镇压群众的血雨腥风远远超过文革之初刘少奇的批反动学术权威和揪右派学生。毛亲自指挥的“三大战役”乃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

我敢断定，毛一定怀里揣着一个文革结束时要给几百万知识者和普通民众戴上阶级敌人帽子的计划。因为戴“地、富、反、坏、右”帽子的阶级敌人随时间推移人数正在自然和非自然地减员，亟待补充，以保持必需的数量。制造这样一批社会贱民，交给工农兵群众实行专政；只许贱民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是毛的独家发明。如此，既可以证明“阶级斗争”理论是绝对真理，又可以使多数群众因为能对活生生的敌人拥有指手划脚权而产生社会优越感，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同时，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强大的威慑力自不待言。有位网民和我“英雄所见略同”，但他说得要比我透彻精辟多了。他写道：“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即侥幸还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于坠入百分之五，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极权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就是让人们永远处于恐怖状态。毛泽东的奴役人民的独门功夫，就是让人们在恐怖的同时，还要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在当家作主。他的秘诀就是暴力镇压整肃与谎言欺骗愚弄双管齐下。

林彪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却以鱼死网破的激烈方式回应毛泽东对他的整肃。这肯定完全出乎毛的意料，毛的如意算盘不得不搁置起来。所以我有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的推断。

~~~~~

## 【人物传奇】

### 杨宪益传（节选一）

• 雷 音 •

#### 9 4 . 被捕

1968年4月27日晚上十一时左右，杨宪益在外文局大楼办公室被捕。紧接着，戴乃迭在家中被捕。这个日子是当时参与“行动”的一个当事人回忆的。他说，那天恰逢一位同事结婚，参加完婚礼后，保卫处处长张仁杰对他说：“今天晚上留下来，有任务”。行动前他们和

公安局的人商量如何动手，最后决定把杨宪益叫到办公室“抓”，乃迭就在家抓。

详述这个问题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这时的“文革”形势，经过毛泽东首肯的“上海一月革命”，全国都发生了向各省、市政权的“夺权”行动，并纷纷仿效上海的样板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取代过去的省委省人委。“革命”一经从思想批判变为赤裸裸的“夺权”，那么，争夺“权力”、“地位”的争斗就在所难免了。文斗变成了武斗，全国性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且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围攻中南海的行动如火如荼，百万人的批刘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中央文革的“揪叛徒”的“一号专案组”紧密活动，为“砸死”刘少奇的叛徒罪名加紧搜集“证据”。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等中央文革成员开始鼓吹批判“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的形势越来越乱。

与此同时，文革对中国外交路线的影响日益严重起来，极左派以“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和“发源地”自居，他们要“输出革命”，要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因此，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外交纠纷不断。1967年8月，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京办事处的严重事件。中英关系骤紧。一时，中国几乎跟所有国家（苏、美、英等大国和周边邻国）都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越南除外）。

1968年3月12日，新华社报道，兰州公安局“破获”一起“英国间谍案”。《人民日报》于同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打击敌特间谍分子，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江青在此前后发表了一个讲话，大意说在我国工作的很多外国人，表面上对中国友好，还以专家身份为我们工作，实际上长期从事间谍活动。有些人，解放前就来到了中国，潜伏的时间有几十年。这个讲话以后，大规模抓捕外国人的行动开始了。杨宪益在回忆中说：

68年年初，江青就说过这个话。她说不要相信在这儿给我们工作的外国人。外国人中间有不少是特务，而且有些是潜伏很久的，解放前就到中国来了，假装给我们工作，实际上是特务。她这个话一说，就开始抓外国特务了。68年就开始了。68年初抓了一个学校的几个美国人去坐牢。在我们这儿先是抓了一个爱泼斯坦。因为爱泼斯坦是一个活跃分子。他要成立国际造反协会，闹的很厉害。李敦白也闹的很厉害，他在电台。这些闹的最厉害的外国人那时候是最革命的，结果就认为最可疑，就把他们全给抓走了。爱泼斯坦就住在我们隔壁楼上，一天早上听说前一天夜里他跟他夫人都给抓走了。我当时觉得跟我自己没什么关系。因为虽然乃迭也是外国人，可是乃迭平常对政治不关心，也没有张牙舞爪地闹。所以抓走了爱泼斯坦我觉得跟我们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到了五一节前，忽然大家就好像对我有点敬而远之了，躲开了。我也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那天晚上我拿了一瓶白酒——那时候因为整天闹运动闹的挺烦的，我常常晚上跟乃迭喝点酒。她喝了一点酒就去睡觉了。到了差不多十一点了，我想我也该睡了，正想睡觉去，外面有人敲门，我心里想又是来找我问材料了。那个时候已经不问关于我的材料，也不斗我了。就是要我揭发别人的问题——前一阵他们就是晚上来找我的。我一看就是那位管战斗队的一个同志跟我们一个搞行政的同志。他朝这几点点头，要我跟他走。我想平常他问我问题就是在隔壁，结果他一直带我到办公室大楼去了。我想也许是外面人来外调了，怎么夜里还来外调。我穿了一双拖鞋，那拖鞋比这个（指他当时穿的鞋）还大两号，踢里踏拉的，我也没换皮鞋就跟着走了。我们上了三楼。屋子里趋黑的。就点了一个台灯。一屋子密密麻麻的一大堆人。我心想这是干什么？我一进去就看见还有解放军，很多解放军把我围在那儿。先是由两个人把我两个膀子拉住，怕我挣扎。然后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就答多大岁数。什么地方人？问完了以后他就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要我签字同意搜查我的房间。要我自己签名。我就签了。签完了以后他看我也没有什么反抗的意思，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又犹豫了半天。他们都非常紧张。我旁边的解放军比我紧张的多。完事以后他们说算了吧，把我带走了。哦，我刚才忘了说，他们一说奉谁的命令将你逮捕就——



咔嚓——给我戴了手铐。我当时还研究了一下，是那种活手铐，越动越紧的那种。到了楼下，工友看到我还挺惊讶的，看我半夜从楼上下来，戴了个手铐，还穿双拖鞋，踢里踏拉的下来了。结果，来不及换鞋子，就把我带走了。

到了外头有个吉普车，（上车后）就要我低头，后面有人把我头摁下来，被摁到他们大腿上，我就睡了，可是还看的到外边的亮光，看的到从哪边走。忽然一阵子亮光，我说这是过了西单了，又往西南角走，到了自新路，地名就叫半步桥，有个大铁门，电动的，自动就开了。我们进去，大门就关了。

监狱在自新路白纸坊，在陶然亭那边，从前鲁迅书里写着叫第一模范监狱。（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在杨宪益被抓以前，出了一件事：杨宪益的家被四个女造反派霸占了。她们占用了杨宪益的客厅，把杨宪益夫妇挤到卧室里。邹霆回忆到这件事时，把它与杨宪益的被捕联系在一起：

三个外文局的造反派，出身好的、根红苗正的女造反派霸占了他的客厅。他的东西没全搬出来，那个橡皮树花盆书架什么的都在里头，就把他的书桌呀抽烟喝酒的东西搬出来了，挤到一个卧室里。（被捕前）最后一次喝酒就在他的卧室里。我坐床上他坐在一个硬木箱子上喝酒。完了我说你送我一下，他出来了几分钟。我说这三个女孩子霸占了你的客厅，你小心一点。可能是埋了什么东西。这不是一般的事，你要警惕。咱们都是搞过地下工作的，应该有嗅觉。这是搞火力侦察的，可能留了什么东西。宪益说不至于吧。他这个人是稀哩马唬的。（邹霆访谈，1995年12月28日）

蹊跷的是，那三个女造反派在杨家只住了几天，又搬了出去。这件事究竟是不是公安局的“火力侦察”，至今仍然是个谜。

戴乃迭是从睡梦中被惊醒的。对她的搜查大大严于杨宪益。她甚至被脱光了衣服进行检查，这是对最“危险”敌人的做法。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乃迭在我被捕后的同一夜里被捕。几个女人甚至脱光了她所有的衣服进行彻底搜身。而对我根本没有搜查。我想，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十分狡猾阴险的外国间谍，一定随身藏着密码或者什么特殊的仪器。她被判单独监禁，比我严厉的多。（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237，雷音译）

笔者从那个参与“抓捕行动”者处得知，这次杨宪益和戴乃迭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戴乃迭把文革小报寄往国外，被有关部门“发现”，怀疑她是外国间谍。邹霆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杨宪益告诉我，戴乃迭用打字机打了一封信，把毛泽东内部发表的诗，还可能有几句所谓最高指示，没对外（发表）的，寄到伦敦的进步朋友那里。这个信被扣了。戴乃迭那时候太崇拜毛主席了。她的主观愿望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可（这边）扣她泄密。（邹霆访谈，1995年12月28日）

现在看来，当时逮捕杨宪益夫妇的最过硬的“罪证”就是戴乃迭的这封信。就这样，仅凭一封“泄密”信件，仅凭“怀疑”就使杨宪益和戴乃迭双双坐了四年牢。

杨宪益和戴乃迭被带走之后，公安部门紧接着对他们的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们把熟睡中的杨宪益的两个女儿叫醒，让她们作为搜查的见证人。搜查完（什么“罪证”也没查到）之

后，公安局把杨宪益的房子封了起来，只留一间房给他的两个女儿住。从此，杨宪益一家五口散作五处，杨宪益和戴乃迭被分别关押，三个孩子各自到了湖北、河北和东北，到“广阔天地”中去“锻炼”了。杨桦分配到湖北鄂城一个农机厂后，受到严重政治迫害，最终导致他神经分裂。此是后话。

## 9 5. 半步桥边卧醉囚

黄苗子先生有一首诗《咏酒呈宪益》，诗中的两句“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捕捉到了当年杨宪益被捕入狱时的精神面貌（尽管有艺术夸张的成分）。

杨宪益入狱的时间是1968年4月27日深夜，履行完入狱手续后他被带到一间挤满了犯人的牢房。十二平米的房间，两排通铺上的犯人像沙丁鱼似的一个挨着一个。杨宪益勉强挤进一条缝隙中倒头就睡着了，他睡的很香，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快七点。他醒后，同狱一个上年纪的犯人与他有以下的对话：

“嗨，为什么把你抓来了？”“我也不知道。”“我们想那么晚了，你又满身酒气，你一定是喝多了，在街上惹了麻烦，所以他们抓了你。”“没那回事。我是在家被抓的。”那人不说话了。忽然，他充满向往地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好酒！我好多年没喝酒了。那酒多少钱一两？”我对他说我不是按两买的。我买的是整瓶，忘了是多少钱了。他问我：“你喝完了吗？”我告诉他还剩三分之一没喝完，他叹息着说：“不知道他们放你的时候这酒还在不在？”四年后，当我被释放回家，我在壁炉台上发现了那个酒瓶，瓶中仍存留有当年没喝完的酒。不过我没有喝它，我把它给了一个年轻的同事。（摘自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2—233页，雷音译）

这个故事流传的很广。笔者在没认识杨宪益之前就在王佐良先生的学生那儿听到过这件事。我想，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如前所述，黄苗子先生还专门为此事赋诗），正是他们从这件事中看出杨宪益“与众不同”的“特色”。试想一个人平白无故地半夜被从家中骗出，然后大张旗鼓声色俱厉地当众逮捕，立刻戴着手铐扭送监狱，他居然没事儿似的倒头就呼呼大睡，睡梦中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酒香，使同狱的犯人垂涎欲滴，犯人们望着这个“醉老头儿”，不知他是何方神仙。怪不得那个老犯人认为他是因喝酒闹事被关。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是一个“阴险奸诈的外国间谍”。

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面。杨宪益当然有忧虑和愁苦。他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妻子乃迭（他还不知道乃迭也像他一样被捕）和两个女儿。他向看守长讲述了他的担心：

我说，乃迭十分容易受惊。她发现我被捕，可能会神经崩溃，或者自杀。而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即将大学毕业，一个中学毕业，她们俩怎么办呢？看守长微笑着说乃迭很好，她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我的女儿，我的罪行与她们无关。所以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6页，雷音译）

看守长的话使杨宪益放心许多。不知是否有意，看守长在说到戴乃迭时还漏了一句：“她很好，跟你一样”。这使杨宪益确信戴乃迭也被捕了。他没有想到，妻子受到的是比他严厉的多的“单独监禁”的“待遇”，而三个孩子因受父母的牵连，过着身无分文（主要是两个女儿，儿子杨桦在分配工作后有了工资），生活无着且遭人歧视的生活。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如果我在监狱里知道了这一切，我会忧心的多。可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仍然是太相信党了。在这种欺骗的话语下，我的担心大大地消释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7页，雷音译）

从此，杨宪益开始了四年的囚徒生活。关于他的生活环境，杨宪益是这样回忆的：

我的牢房是集体的，跟很多人在一起。那天（入狱日）晚上有26个人，很挤。房间跟我的现在的房间（指百万庄宿舍——笔者）差不多大。两个炕，通炕（通铺），人多，不能横着睡，都是竖着睡。就跟沙丁鱼一样一个挨一个。那天晚上很挤，后来人走了一部分，没有那么挤了。中间有一个铁桶，可以小便。有的时候有犯人忽然拉稀了，没办法上厕所了（监狱里除规定上午每人每次十分钟不到的大便时间以外，不许上厕所——笔者），结果就拉在铁桶里面，弄的屋子挺臭，大家都很反对。不过那是偶然的情况。

吃饭是一顿两个窝窝头，有时有一碗菜汤。一天两顿饭。上午一顿是十点，下午一顿差不多是五点。没有早饭。我两个窝窝头吃不完，只吃一个半，剩下那半个给别的犯人吃。有的人饭量大，两个窝窝头不够，觉得饿。我倒是没觉得饿。菜汤没有油。有时候给我们加一点猪油，病猪熬的油。虽然是病猪，反正熬过了吃了也没事。饭钱很便宜，一个月的饭钱才四块钱。那个时候没要我们自己掏饭钱。我们是犯人，要枪毙的。后来把我放了以后，又要我出饭钱。那是后来的事。

犯人跟犯人之间不许讲话，不许告诉自己的案情。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偷偷地讲话。

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九点多钟开始读报纸，有时候背语录。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别的书不许带。后来才让我们读老三篇，背老三篇，背的不好的要挨批评。我从来背的都很熟，没什么问题。

大便是每天早上一次。大家集体叫出去，大家排着队，到一个蹲坑的厕所，大家蹲坑大便。只许十分钟。有的人大便干燥就很伤脑筋。十分钟完了之后就给轰回来，集体走回来。早上起来之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洗脸，时间不到一刻钟。洗脸的地方倒是有自来水。我们匆匆忙忙地洗。有的时候还要赶着洗洗袜子衬衫什么的，那就很紧张了。一刻钟以后又被带回来。别的时候就在牢房里头关着。

每个月有两次，叫放风——有时候他（看守）忘了，忘了就一次都没有——放风就是把你们集体的叫出去，到外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到一个也是关起来的四面有墙的那么一个地方，上面没有顶，可以有点阳光。在那里头集体地转，转个一圈两圈，然后再把你们叫回去。放风大概一次十分钟左右。（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关于提审，杨宪益回忆说：

每个人根据他的案情不同叫出去提审。开头的时候挺严格，还夜审，好像挺紧张似的。夜里，十二点，把你叫起来，叫你出去。还有带枪的人，枪上带着刺刀，押送你走。好像要押着去枪毙的样子。为的是吓唬你一下子。提审都是一套老公式。一开头对我是很严格的。说杨先生你不要隐瞒什么，你的事是铁板子钉钉的，都是实打实的，隐瞒也没有用。你老老实实交待吧。你不交待的话，明后天早上我们就要公审，公审完了我们就拖出去枪毙了。你还是老实交待好。交待了可以不枪毙。……刚一开头的时候他问我你知道犯了什么罪？我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他说你想隐瞒是没用的。你的材料有一房子那么高，都是你的材料。我们都调查清楚了，你还是老老实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那一套玩意。

第二天早上起来给我一搭子纸，让我写材料。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只好把过去认识的人，朋友和亲戚的名字都写下来，我跟他们是什么关系。中国人我大概交待了一百五十个人，外国

人我写了一百个人。我写了一大堆材料给他。他看这个什么都不重要。他说你这是故意隐瞒。你再不老实我们就把你提去公审。我们刚刚毙了一个遇罗克。就是天天闹那一套。

开头的时候半夜里提审过两三次。后来一般都在下午的时候多。在林彪出事以前比较严厉，好像是动不动就快提走了，给枪毙了。林彪出事以后比较缓和了一些。后来看起来不像要给拉出去枪毙的样子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笔者在采访中曾问杨宪益这样一个问题：审讯者说的要“公审”要“枪毙”的话，你当时认为仅仅是威吓还是有可能真的实现？你怕死吗？杨宪益是这样回答的：

我觉得有可能实现的。因为那时不断地传讯，每一次都很凶很凶。总是警告我说一两天又要搞公审了。那时候是搞过好多次公审，每次公审都枪毙几个人。不过我当时也不大在乎。因为我好像是怕疼，受刑我是害怕的。可是要是死的话我一点也——从来我对这事不怎么关心。要真是拖出去枪毙，毙了就毙了。就算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黄苗子先生在一篇谈杨宪益的文章中说：“昔金圣叹有言：‘杀头，快事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妙哉！’个中境界，宪益有焉。”黄苗子不愧是杨宪益的朋友，他对杨宪益精神世界的把握有独到之处。

## 9.6. 在监狱这个社会大学校中

四年囚犯生活在杨宪益一生中是个独特的阶段。尽管对自己被捕感到意外，但杨宪益很自然地完成了“公民”到“囚犯”的转变。因为他这个公民早已沦为“贱民”，他被“揪出”人民队伍已近两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是人们随时可以唾骂、批斗、侮辱和嘲弄的对象。对一个“牛鬼蛇神”来说，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啻为一个巨大的监狱。从大监狱来到小监狱，对杨宪益似乎并没有太大困难。人对苦难的耐受力似乎是无限的。

经过两年多的频繁提审、威吓和讯问，从71年下半年起，狱方对杨宪益的提审越来越松，后来就干脆不管他了。杨宪益的精神压力明显减轻。他也从一个“新号”成了“老号”。四年中，他换过很多囚室，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他回忆了一些狱中的人和事：

我们那儿住的人有两种情况，有的人关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像我那样后来就放了。有的是关一阵以后就拉出去。事后才知道，拉出去就枪毙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当笔者问杨宪益“拉出去枪毙的人有没有公审”时，杨宪益说：

都有公审。不过公审都是形式主义的。走一个形式。等于说，就是拉到那儿开一次斗争会。大家在一起喊喊口号，然后就枪毙了。枪毙人都在酒仙桥那儿。酒仙桥桥底下是刑场。把人带去，一般的死刑犯都戴着铐子，然后从背后用脚一踢，一踢就站不住了，就跪倒了。一跪倒，后面的人就拿手枪在你后脑勺上一枪就完了。完事以后还要跟家属——来收尸的——还要跟他要子弹费。四毛钱还是多少钱。家属还得给子弹费。没人收的呢，就拿一个芦席一包，或者是埋了，或者是烧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据杨宪益说，以上情况是一个被“陪绑”押往刑场的犯人亲口告诉他的。

狱友们最佩服杨宪益的是，他居然在毫无信息的情况下，“预见”到林彪出事。杨宪益在回

忆中多次谈到此事，并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深感自豪：

那时候我们只能看《人民日报》，别的东西不给我们看。外面的消息我们又不知道。我就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看外面的情况。我看到先是批判陈伯达，最后黄永胜也不见了。71年，那一年忽然沉默的很，林彪的名字也不见了。到了国庆，这一年的十月一日特别的不同。我注意到西哈努克来的致敬电。西哈努克跟我们是熟人的。他平常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然后是别人。他这回忽然改了，不提林副主席了。光提毛主席，然后就是周总理，跟以往不一样。另外就是过去林彪每次十月一日他都要登天安门，都要嚷一阵子。声音就跟我们过去在英国听的希特勒一样。有点歇斯底里，嗓子挺哑的在那儿嚷。这一年他也不露面了。我心里想，看起来林彪也完蛋了。我们每个人手头都有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前面有一个再版前言。平常我们每天都要背诵再版前言的。那时候背的很熟，现在想不起来了。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挺开心的。我就把我那本小红书上的再版前言给撕掉了。正好那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打砸抢分子给关进来了。那个人偷偷跟我说：听说林彪出事了。我说不知道。大家说不会吧，林副主席怎么会出事呢？后来果不其然，一天下午忽然查监的人很严肃的“啪”进来了。那时离十一已经过了几个月了。说你们把红书全交出来。我们就都交出来了。他就一本一本的翻。翻了一本，就放在一边拿走了。又翻一本，又拿走了。我的那一本呢，一翻他愣了，好像没有再版前言；又翻，翻了几次。他也不说话，想了想也不说什么就“啪”地扔给我了。大家就纳闷了。说怎么我们的红宝书全给没收了，你的那本不给没收？我没说什么，就笑笑。我说再过几天你们就明白了。后来又过了几天，证实林彪出事了。所以这个事我有先见之明。我很得意，非常之得意。一直到今天想起这个事还挺得意。别的年青犯人都挺佩服我：诸葛亮！坐牢期间最得意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从此，杨宪益的难友们对他无比佩服。杨宪益在回忆中说起他教他们唱苏格兰歌曲《罗蒙湖》、《友谊地久天长》，背中国古诗。他把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句一句地教给他们。年轻的“打砸抢分子”们如饥似渴地跟着学，从头到尾跟着背。牢房里洋溢着动人的学习气氛。

## 9.7. 陷身囹圄死生轻

“陷身囹圄死生轻”是杨宪益在戴乃迭去世后写的悼亡诗中的一句。全诗是：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首沉痛的诗高度浓缩了杨宪益和戴乃迭坎坷多难的一生。其中“陷身囹圄死生轻”正是杨宪益监狱生活的深刻写照。也是许多同狱难友的命运。杨宪益多次回忆，在入狱的前两年，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拖出去枪毙”，每时每刻都感到死亡的威胁。他看到同狱的难友中，告别时还高高兴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不是释放，而是刑场。杨宪益痛感作为一个犯人的“命运不可测”和“生命无常”。尽管杨宪益对生死看的很淡，但是，这种“厄运随时可能降临”的“无限期的等待”对人的精神的折磨却是巨大的。这种无形的折磨在杨宪益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杨宪益在回忆中谈到，他即使被释放时也怀着忐忑的心，不知道让他“收拾行李”是好兆还是恶兆：

72年5.1节前夕——我的日子很有意思，有许多都跟八月节有关系，有许多跟五一有关系，这个又是赶到五一前夕——忽然叫我收拾行李。收拾行李不等于好事。有时候收拾行李就拉出去枪毙了。或者是换到别的监狱。他反正事先不告诉你。我经过的犯人很多，我看到好多犯人收拾行李出去了，出去了人就没有了。有的人听说是放了，有的人就枪毙了，都有。

杨宪益之所以心情忐忑，是因为在这次通知“收拾行李”之前的两个星期，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这件事使所有的难友都为杨宪益的命运担忧，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小小的囚室：

有一天，看守突然叫我出去。他把我带进一个大房间，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把一块写有我的名字的硬纸板系在我脖子上。之后，他打开了所有的灯。一个摄影师进来给我拍了照。然后我被送回了牢房。我把这事告诉狱友以后，他们神色沉重，有的人甚至流露出悲哀的神情。他们说看起来我马上就要宣判了，不然他们不会像那样给犯人照相。我也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雷音译）

这次的照相，的确非同寻常：被剃着光头的杨宪益胸前挂着写有“杨宪益”三个字的大牌子，拍下了标准的“犯人像”。摄影师除了拍正面像外，还给他拍了侧面像。这一切活像被判死刑的犯人临刑前的留影。对于这件事，杨宪益的反应是：但是，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已经坐了那么多年牢，不再为将要发生什么事而烦心劳神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

这是典型的杨宪益式的态度。许多记者和朋友都说杨宪益为人“潇洒、散淡”，岂不知，他的潇洒和散淡的性格，除了遗传于父、祖辈的血脉之外，还来源于牢狱的冶炼。“身陷囹圄死生轻”，当生死大权操在强权手中时，命如蝼蚁的小民怎么对应？他不“潇洒”又能如何？！

## 9.8. 戴乃迭在狱中

当1994年笔者采访杨宪益和戴乃迭时，戴乃迭已经患病，很少说话了。关于她的狱中生活，笔者还是从她的姐姐希尔达（Hilda Brown）女士那里了解到点滴情况。以下是2002年10月20日希尔达的讲述（希尔达说的是英语，笔者只记录大意）：

格莱迪丝（戴乃迭的本名）在1974年第二次回国的时候告诉我，她刚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住的很差。伙食也很差。窗子是破的，冷风灌进来。又冷又饿。过了几个月，伙食才开始好转。她不太愿意说起监狱的事。因为监狱那一段是不愉快的回忆。监狱太差了。

由于她没有做任何错事，所以当提审员问她的时候，她神色自若。与审判员的“大敌当前”有天渊之别。提审员问她：你没有什么说的吗？格莱迪丝这个“特务”却答非所问的说“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样了？”提审员说“他们有人照顾”。这个回答虽然是谎言，但是非常重要。正是这一句话，着实安慰了格莱迪丝，使她得以安心渡过四年的铁窗生涯。（当乃迭出狱后听说她和杨宪益的被捕株连了所有亲戚，两个女儿流落农村无人照顾时，她顿时哭了。她说如果她在监狱里知道此事，她真活不了了。——笔者）

希尔达还讲了戴乃迭在狱中与看守斗争，争取较人道的监禁条件的事：

当时（六十年代末）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很红火。提审员对格莱迪丝说你看美国对待黑人多不好，可我们对你很好。格莱迪丝立刻反驳他说“可是黑人在监狱里还能每天出去放风，我却不能出去”。经过她的争取，格莱迪丝才开始能够出去放风了。

她在监狱里靠背诵中英文诗歌打发日子。爱清洁的她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的干干净净，以此来活动筋骨，消磨时光。

监狱里不能看任何书籍，只能读马恩列毛的书。格莱迪丝就通读了一遍《资本论》，还写了很多读书笔记。（可惜的是，这些笔记都没有留下来）

据当时同在半步桥看守所坐牢的郁风回忆，每次看守送饭给各监室的女犯人时，她总听到隔壁牢房里传来“谢谢”的声音。后来她证实，这正是戴乃迭。戴乃迭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保持着一种自尊，维持着做人的基本礼节，使郁风感慨颇深。

整整四年的单独监禁，使戴乃迭出狱后得了自言自语的后遗症。丈夫和女儿都发现，她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这种现象过了一两年才消失。

## 9.9. 来自英国的请愿书

戴乃迭的母亲塞林娜收到她最后一封家信是1968年4月写的。从此以后，戴乃迭就渺无音信了。87岁高龄的塞林娜忧心如焚，她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女儿的下落，都毫无着落。思之再三，塞林娜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述说一个母亲对女儿突然失踪的担忧，请毛泽东主席能够亲自过问一下此事。这封信是用中文写的（塞林娜在中国住了三十年），措词“非常机智和得体”（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北京小金丝胡同）。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直到塞林娜在1970年8月以89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时，她没有戴乃迭的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戴乃迭是不是还活着。塞林娜去世后，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担起了寻找和营救妹妹的担子。起先，她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大意说“我认为您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请您转告我妹妹，我们的母亲去世了。”机智的希尔达试图用这种方式达到双重目的：既通报了母亲的死讯，又得到乃迭的下落。希尔达在采访中说：“我那封信纯粹是私人信件。因为我认为中国人懂得，如果一个母亲去世了，她的孩子应该知道这个消息。这个信不是什么政治事件，所以我认为他们能接受它。”但是，这个信也石沉大海。

希尔达意识到单靠个人力量的无济于事，她开始向社会呼吁。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她通过所在地区的议员在议会中催促英国外交部门通过外交途径营救戴乃迭。她还在英国的汉学界和宗教界广泛活动，征集呼吁释放戴乃迭的请愿书。请愿活动很快在英国各地开展起来。在戴乃迭的中学同学瑚德女士的帮助下，请愿书被寄往英国各个教区（戴乃迭的父母都是伦敦教会的传教士），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最后，这封请愿书上签下了两万个英国百姓的名字。以下是这封请愿书的原文：

给周恩来总理的请愿书支持格莱迪丝（泰勒）·杨女士

我们——以下所有签名的人，要求被单独监禁在中国三年之久的英国公民格莱迪丝（泰勒）杨能够与她在英国的亲戚通信。

在英国外交部、她的家庭、她姐姐和弟弟所在区的下院议员约翰·苟斯特（John Gorst）先生和马克·伍德纳特（Mark Woodnut）先生多次努力探询有关格莱迪丝的下落之后，最近我们从官方得知她“活着，情况很好”，我们欢迎这个消息。不过我们仍然急切地希望她的亲戚能和她重新建立联系。

签名人家庭地址职业（此信资料由希尔达·布朗女士提供，雷音译）

这封签有两万多个名字的大型请愿书由下院议员约翰·苟斯特和希尔达在媒体报道下通过公开仪式正式转交给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馆。

第二封信是由牛津大学东方学院发出的给周恩来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由23名英国学术界著名汉学家签名。这23名学者来自英国各大学中文系。以下是请愿书全文：

亲爱的周总理：

作为英国的中国化学者——我们一直希望看到英中两个国家关系的改善——我们所有的人都深感受惠于格莱迪丝·杨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她的翻译对扩大鲁迅著作和其他现代中国作家作品在我国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她几年前在英国电台的广播极大地帮助了英国人民对现代中国生活的理解。

我们高兴地从官方渠道得知“格莱迪丝·杨还活着，她很好”；但是，鉴于她的家庭和朋友已经近三年没有与她联系，我们仍对她的现状和未来系念于心。因此，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允许她重新和她的家庭写信，她将会为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起到作用。

我们都与格莱迪丝相识。我们一直认为她是中国的好朋友，她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您的忠实的（以下是签名）

1971年4月23日（此信资料提供者：希尔达·布朗女士，雷音译）

这封信是直接寄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提到的“广播”是戴乃迭1961年第一次回国时受英国BBC电台邀请，在该电台的一个“Woman Hour”节目里定期报道中国的妇女儿童的生活、教育状况的事。她的报道使很多英国人减轻了对中国的畏惧和猜疑，拉近了中英两国人民的距离，消除了两国人民之间在心理上隔阂。她是中国最好的“民间大使”。采访中，希尔达反复谈到这一点。她说：

她是一个中国最好的使者。因为当时与她见面的朋友们或其他人发现她是一个那么年富力、富有自尊感的人，如果这样的人说中国的好话，那么中国想必也是一个好地方。她对人们理解中国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她不像一个崇尚暴力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人们感到可以相信她的话。所以她是很好的中国的代言人，她是相互理解的一座桥梁。……她不只是在1961年发表广播讲话，此后她定期——可能是半年一期——从中国寄录音带到BBC，谈中国妇女儿童的现状。许多人都听了她的广播，对她讲的非常感兴趣。可是寄录音带时麻烦很多。因为中国政府每次都要检查录音带的内容是否OK才放行，这种状况很悲哀。其实，Woman Hour是BBC的一个全球节目，全世界各国都有人给它报道当地妇女儿童的状况，格莱迪丝只不过是一个从中国发报道的人。因为她会说英语。（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北京小金丝胡同）

100．获释：“现在放你是对的，当初关你也是对的”

1972年4月，当杨宪益被通知“收拾行李”到狱方办公室时，他听到释放他的官员说“你的拘留期结束了”。这句话使他大吃一惊。四年前，他明明是当着单位众人的面被宣布依法“逮捕”的，怎么突然改口了？在杨宪益的自传和口述回忆中，谈到这一点时他的愤懑溢于言表：

有一天，他们让我收拾行李跟他们走。我走进一个办公室。一个官员对我说你的“拘留”结束了。四年前，当我进监狱的时候，他们当众宣布逮捕我，而且我被戴了手铐。不过现在他们显然是改变了决定，把逮捕改称为“拘留”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雷音译）

更滑稽的是，杨宪益被关押了四年，这四年的伙食费居然要让他自己出：



他们说以前不是逮捕，我们没有逮捕你。我们一直是拘留。乃迭也是叫“拘留”。我出来以后这四年的工资全退了。乃迭不给。一个钱也没有退。退了我四年的工资，可是说你在里头的伙食费要扣。所以我等于住了四年旅馆。还得交伙食费。好在伙食费不多。那时候一个月才四块钱，扣的不多。（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至于杨宪益的问题的“结论”和关押他的原因，官员当然也是理由十足：

那位官员说，他们为了弄清我的问题费了很大的努力。他们跑了21个省市，调查每一个细节。现在他们可以说，我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我是清白的。所以我可以回到原单位，恢复工作了。

“但是，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无完人’。你为党做过好事，但也做过坏事。一个人总是一分为二的嘛。我们希望你将来继续做好事，不做坏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雷音译）

于是，带着这个“一分为二”的尾巴，杨宪益出狱了。几年之后，杨宪益才知道他被捕的真正原因：一个原英国大使馆的中国雇员、司机熊某，因为解放前曾为英国使馆服务而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关押，在受尽折磨之后他承认自己是“英国间谍”，他说“如果我是反革命，杨宪益也是反革命。杨宪益整天都跟伊文思在一起”。凭他这一句话，杨宪益成了“嫌疑犯”，被“内控”多年，进而在文革逮捕高潮中正式被捕。

释放杨宪益时，狱方官员退还了当初抄查杨宪益的家时没收的物品：一本北师大印刷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一本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和一本杨烨的笔记本。这就是四年前大批公安人员兴师动众深夜抄家的全部“罪证”！

（未完待续）

~~~~~

【亡灵祭坛】

赵九章之死

• 李鸣生 •

赵九章是我国著名科学家，“651”卫星设计院院长。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对现实，他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名字就叫：自杀！

赵九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

在赵九章的记忆中，他一生经历了三次较为重要的选择。但这三次选择，也从未导致过失眠。

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赵九章一来到这个世界，便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戴季陶的外甥，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戴季陶为国民党元老，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自杀，不是军统特务——编者）这样的条件，他若要走仕途，自然前程似锦、不可限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的道路。他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戴季陶时常发生矛盾，后来便离开了国民党机关。

靠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只用三年工夫，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他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在话下。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赵九章是1966年10月靠边站的。他人靠边了，心却无法平息。面对神圣的科学与强大的政治，他毅然选择了科学，并决意为此献身。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关心人造卫星。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

1967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利统统被剥夺殆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补偿给他的，除了学习班，便是白天夜晚没完没了的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

他有生以来几乎没逛过大街，这次倒好，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逛一趟，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广告牌，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等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然后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又有病，也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批斗一次次升级（后来他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好了”的念头渐渐打消，随之涌出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刚开始，他不时还能打听打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打听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于是，一种莫大的焦虑、莫大的空虚和莫大的失落一并向他袭来，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外交部长乔冠华。（当时乔冠华不是外交部长——编者）乔冠华既是中央领导，也是他的朋友。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问问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

然而，当他去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时，翻遍了家里全部留有汉字的纸片，最终也没找到那个几乎寄托了他所有希望的电话号码。因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腾过多少遍了。

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回忆那个仅有四个数字的电话号码。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电话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上几个个儿的一代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四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组合起来。

不过，他并不就此罢休。利用一次打开水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让他尽快帮着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也依然没找到那个仅有四位数字的电话号码。

邓增昆后来这样回忆说：

赵九章先生当时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什么本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

我怕伤赵先生的心，就躲在家里，不敢见他。

后来，还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刚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当我告诉他没找到号码时，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两眼也顿时失去了光泽。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一步步地挪回家里。从那以后，赵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觉，就一个人爬起来绕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并不时抬头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时，他干脆站在那里，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还一边流着长长的泪水……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亦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怀着一线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一个国家的知识者，怎么就可能永远是个“罪人”？！

他不是党员，没有资格交党费，每次见别的同志交党费，他心里就会涌出一种复杂的滋味。但他是工会会员，他对中国科学院，对自己的国家，始终怀有一分责任，藏着一分爱心。没资格交党费，交工会的会费总是可以的吧。因此，从建国起，他每月只要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从工资袋里抽出100元钱。拿去交工会会费。现在，他虽然从科学家变成了“牛鬼蛇神”，但每月100元钱的工会会费照交不误。只不过有时当他拿着这100元钱去交费时，却到处找不见人；或者好不容易找见了人，别人又不肯理他。但他不管这些，只要时间一到，该交照交，该找照找，今天找不着明天再找，这个不理再找另一个，直到把这100元会费交出去才肯罢休。

其实，身为大科学家的赵九章经济上并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几乎都是馒头稀饭咸菜，与一般科技干部是一个生活标准。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是中央研究院里有名的少壮派，可他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在当年工资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在他身陷困境、惨遭迫害的日子里，他之所以要每月拿出100元人民币去交工会会费，无非是为表明他对党的忠诚，表明他作为科技队伍中一个分子的存在。

这一时期的赵九章，尽管身为“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了，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了，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无权过问，涉及到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也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也无权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想起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同时，他也无法忘记那些同在一起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专家们。他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便把搞卫星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因此，他对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总是格外关注。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稍有一点不祥风云，都会令他揪心不已，焦虑不安。尤其对卫星设计院的技术总体负责人钱骥的命运，他更是尤为关注，因为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便与钱骥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开始他还能有机会接触一下，偶尔也能见到一眼，可后来连影子也见不着了。他为此十分着急。

一天，他终于逮住个机会，托人悄悄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为怕钱骥因此受到牵连，他不得不用德文来写这张纸条，其意图只有一点：希望钱骥能尽快告诉他哪怕是一点点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进展情况。

然而，这张书写着漂亮德文的纸条却石沉大海。

本来沉默的赵九章变得更加沉默了。他当然无法知道，这时的钱骥其实已陷入了与他同样无奈的命运之中。

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在押送途中，由于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铁丝，故他的脖子很快便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过任何折磨他的机会，一会儿叫他走路的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再下到水沟里。如此反复，一路折磨不止。

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待。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坏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耗费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他的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

尽管如此，赵九章那颗痴迷于人造卫星的心，依然“死不悔改”。身陷困境的他，虽然无法准确预测出中国空间技术将来到底会是什么前景，但有一点他却非常清楚，即发射人造卫星的路必须有人往前走，不仅竖着要走，横着也要走。他深知，他们这一代科学家，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而只属于现在。他们的选择，就是让现实拥抱自己，吞没自己，甚至与现实同归于尽；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就是牺牲——以牺牲自己作桥梁，为后人架设一条通向明天的路，而且尽可能让这条路少一点曲折，多一些平坦。

然而，1968年6月，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他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

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

1968年6月8日这天，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组织连日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负责，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并打算找几位干部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生产中停工的问题。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他放心不下，还是回了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几个气势汹汹的“左派”人物便冲进家门，架着他就往楼口推。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一边扔掉他的眼镜，一边扇他的耳光，还一边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他顿时鲜血直涌，倒在了地上。

但几个家伙仍不罢休，拖着他就走。途中，他脚上的鞋袜全被拖掉了，也没人理睬，照样

将他光着脚丫拖到了所谓的“左派”总部，然后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即便瘫在了地上……

“左派”头头们见状，便吩咐手下人将姚桐斌拖回去。于是，几个家伙又将姚桐斌拖回他家楼前的人行道上，然后又朝他身上猛踢几脚，这才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邻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由于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3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震惊了国防部，也震惊了党中央。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

姚桐斌死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如果说在姚桐斌死之前，他对眼前的这场“大革命”多少还抱有一种幻想心中还默默燃烧着一盏希望的灯火，那么姚桐斌死后，他的这种幻想消失了，心中那盏本来就不明亮的灯火也开始变得暗淡微弱了。

在那几天里，他的头发陡然增白，恍惚中，他像沿着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之路重新走了一遍，而一路拾到的，都是迷茫、疑问和困惑。

一种人生的巨大困惑像阴云般笼罩着他，让他无法排解，无法超越，他第一次在自己71岁的生命中深深触感到一种本质上无法消化的痛苦。

每晚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他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为了躲避这人间的恐惧，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举向繁星点点的夜空。

那一时刻，他恍惚感到，法国罗马塔楼上那悲壮的钟声忽然划破夜空，徐徐飘入他的耳际——他想起了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透过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见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僧侣们手中高举的熊熊火炬充满着杀气；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用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制的钳子死死夹住他那呼唤真理的舌头；他脚下的干树枝被点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长长的杆子将耶稣受难头像朝他慢慢伸了过去……蓦地，布鲁诺转过脸来，一双愤怒的眼睛射出太阳般的光芒……

赵九章禁不住浑身一阵颤栗，再也无法忘记布鲁诺那双眼睛。布鲁诺一生都在异国四处流浪，却始终无限思念自己的祖国，然而当他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时，祖国迎接他的却是熊熊的火刑架！布鲁诺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当他突然醒悟到这一点时，整个身心似乎都被某种怪异的东西击垮了。面对夜空，他无法抗拒宇宙间那巨大的诱惑；面对现实，他又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也想写一张大字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就叫：自杀！

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事实上，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在国庆节的前三天已经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革命“左派”分子见到这封请柬后，当即便给扣压了。

赵九章对此当然不知。假如他知道有此事，假如他知道他一直忠爱的国家依然还没忘记他，那么，或许他人生的态度会来一个根本的转变，至少他在人间的时日还可再延长一些。

然而，他被政治的黑手死死蒙在鼓里，不但请柬没见着一眼，甚至连一点点信息也毫无所知。

于是，他心中剩下的那一点点希望之火熄灭了，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就这样，中国的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永远离开了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或许，他对这个世界已懒得再说什么了？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的罗舜初将军很快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热泪。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说，当年吴玉章先生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并且，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还第一次停止了办公，当即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查问这一情况，随后又委派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

然而在那混乱的年代里，连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性命都无法得到保障，何况一个科学家“畏罪自杀”，其结果又会怎样又能怎样呢？

据后来统计，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个！

~~~~~

## 【浩劫实录】

68年，姚桐斌去世前后——杨国宇日记

• 杨国宇 •

〔作者介绍：杨国宇（1914—2000），1933年参加红军，1978年任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是他担任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时期的日记，由作者本人提供。〕

1968.6.8

中午南苑915、916两派发生大武斗，有上万人。703所所长姚桐斌被915殴打致死。前去制止，又无法接近，也无法弄清情况。天气热，打得也火热，想忙于制止，又制止不了。

1968.6.12

召集915、916两派头头开会，张翼翔主任参加。研究制止南苑发生的6.8武斗和姚的尸体解剖问题。经耐心做工作，两派共同商定了六条：1.疏散人员；2.双方人员撤出武斗现场；3.食堂开饭；4.211医院拿出整改措施；5.发工资；6.双方交出武斗工具，集中起来由军管会处理。军管会还规定了五条：1.群众各回原单位。由军管组织学习；2.721、731医院都要按10条执行；3.伤员生命垂危，允许家属探望。双方扣的人交军管会，保证安全；4.带头抄家、冲医院的人，要揪出来；5.组成执行协议、制止武斗监督小组，各派三人，两派总部各一人。为制止武斗，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

关于姚的尸体解剖问题，由北京市公安局派来法医庄明漆、赵金龙解剖，但必须答应他们10日提的三个条件，否则不来。我同意不变，两派也不阻止。

解剖姚的尸体，他妻子不同意，耐心做了一夜的工作，还是不同意，逼得我发火了。我说：“老子不管了，如不解剖，权威部门不做出结论，将来别人说姚桐斌同志是自杀，看你咋办？”这时姚的妻子才同意。解剖了，姚妻出门后，又进来三个年龄稍大的，向我威胁说：姚桐斌是周总理从德国要回来的材料专家，你们无故打死，你管不了，我们抬走，到天安门游行，向世界公布。我答：你们来得正好，抬走吧！他要我向总理报告，我打不通。又提出向外交部报告，我答：抬走吧！不要罗嗦了，我要休息！三人自动退出门了。又出了问题。到何处去解剖？国防工办联系去301医院，不行。到空军总医院，不行。我只好去海军总医院联系，同他们做工作也不愿意。我说，同意不同意也拉到海军医院来，他们只好同意，但也提出三个条件，他们不参加人。唉！谁都怕七机部的两大派。解剖地点定了，但拉尸体的车哪里出？我请海军帮忙出车，不行。请空军帮忙出车不行。最后国防工办说由一院出车。因人是一院的，我给一院打电话等于白打。没办法，决定向运输公司租车。他们听说是拉尸体的，有车也不租。还说什么：七机部游行出动车最多，还租我们的干什么？最后逼上梁山，叫七机部部直汽车队队长亲自开车。并规定他不准问干什么，不准看干什么，听我指挥，叫开哪就开哪。这个队长真不错，都听我指挥。天难！地难！一个难题接一个难题，搞了我半天，真是晕头转向啊！最后总算把尸体拉到海军总医院解剖了。可是正在解剖中，姚妻又提出问题，只好耐心做工作。最后公安局的法医解剖验尸完后作出初步结论：姚桐斌同志是钝器伤头致死。

1968.6.13

我被群众组织的一些人弄到部直南楼，围攻我，大骂我，要我立即抓出凶手。我说凶手一定要抓，但我一个人能抓出来吗？围攻从06：30—11：30，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呀！无怪七机部在最困难时无任何领导或参谋干事来帮助一下总理。我曾亲自听总理鼓励粟裕说：粟裕你七战七捷，怎么今天成了个大姑娘。以后曾听群众传说：粟裕坐了直升飞机到南苑上空转了几圈。

1968.7.31

为落实毛主席7.28关于大办学习班的指示，我到群众中去找办法。我听取了技术司、

科研局、计量站、劳资司、计划司、915、916头头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如下五条。

（1）从大联合开刀，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应该联合。

（2）一派撤消，一派留着的情况下，要联合是不可能的，撤消与不撤消的都应该限制其不利于大联合战略部署的行动。

（3）借东风，大力宣传毛主席的7.28指示，讲清形势。

（4）军管人员忠不忠于毛主席，紧跟不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紧跟则要旗帜鲜明，依靠两派群众组织搞好大联合。

（5）大宣讲，大宣传，各院各找个工厂试点，下决心：1.与群众组织脱钩；2.关着门闹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3.人人上班，坚守岗位八小时；4.揪的干部立即交出，由军管会管理；5.联革会立即恢复工作；6.成立革命领导小组；7.不武斗；8.开展大批判。不怕反复，反复一次，深化一次，群众厌烦一次，动员工人立即回厂生产。最高标准达到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本厂不参加派性活动，大联委正常工作。

征求群众意见，群众反映好，建议军管按7.3、7.4制止武斗、办学习班的办法做。还有30几起打人事件，不管哪派都得处理。各种各样意见，对我们工作很有帮助。

1968.8.6

我们到国防工办军管小组汇报，栗裕等同志在场。最后栗裕、陈华堂、张培元等，研究的一致精神：

1.不要急，急无用，要做工作。2.916表示各部委问题，国防科委问题是三军问题，我们不引导，又不限制（上级不了解情况，你能限制吗？）3.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搞，这是战略布置，不能打乱。

1968.8.21

黄作珍同志谈：38军、56军军宣队来京，欢迎。军队人员召开个会，还请谢、温、郑讲话。北京情况很好，主席批的7.3布告，又接见五个总部的负责人。8.15又接见首都工宣队与工人代表。700万人活动，对各方振（震）动很大。但大有大的难处，200多个单位（大专院校除外），还有189个有问题，（七机部、国防工办不在内）。任务是很光荣的。你们两个团，38军334团到七机部，579团负责7所大专院校、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乐团等。七机部去3000多人工宣队。军宣队1500—2000人（还未定），总共到七机部5000人左右。

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的任务：

（一）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双方抓的人，放人。

（二）坐下来谈判，达成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

（三）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

（四）整党，精简整编。长期打算、持久战、手抓沙子，有土才长庄稼。

几条要求：

1.不轻易表态，表态则由集体研究讨论。

2.作调查研究工作，把各派的历史情况摸（摸）清楚，模（摸）一下他们的功和过，模（摸）一下地富反坏右、走资派。

3.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915、916，不能一派吃掉一派，一派压一派，谁也不能吃掉谁，谁也不能压垮谁。



吃掉、压垮都不是办法。这是我们的认识和支左工作的根本依据。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